

日本能否爆发社会革命

日本能發否會革命

孫文庭編

國民二十七年一月初版

國民二十七年二月再版

戰時讀物編譯社出版

日本能爆發社會革命

版權
所有

實價每冊壹角五分

著作者 孫文庭

出版者 戰時讀物編譯社

發行所 黎明書局

漢口發行所：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發行所：惠福東路惠新西街
重慶發行所：珠市街

經售處

新民圖書雜誌社
上海雜誌公司
生活書局
華中圖書公司
北新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

日本能否爆發社會革命

目 錄

- 一 日本的社會革命會不會爆發？……………二
- 二 日本社會革命的初步考察……………一三
- 三 日本經濟的脆弱性……………二八
- 四 日本國民不堪戰爭的負擔與歷史……………三七
- 五 日本國內反戰運動……………四四
- 六 日本工農的革命運動……………五一
- 七 日本爆發社會革命是對華作戰的結果……………五七

一 日本的社會革命會不會爆發？

日本農民的極度窮困和不滿現狀，封建殘餘的阻礙資本積聚和中產階級的健全發展，國內市場的狹隘，對工人階級和一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野蠻壓迫，知識份子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活動，巨大的工匠和小工商業者階級的革命醞釀，一切政治社會自由的不存在，皇朝和官僚的專制，警察的暴虐，統治階級和整個行政機關的普遍腐化——這一切是現代日本的特徵，使我們回想到沙皇時代的俄國。不論日本，軍隊有怎樣多，不論日人宣稱它怎樣地忠誠，不論日本向亞洲的擴展有怎樣成功，不論怎樣宣稱民衆對天皇的熱忱，實際上日本在政治上、社會上的不安全和接近於革命，正與舊俄相同。

日本和帝俄的主要區別，就是日本還沒有經驗過它的一九〇五年。因爲日本還沒有受過軍事失敗（或根本沒有和設備良好的強國軍隊打過）羣衆的革命情緒被壓到暗中去轉移到盲目愛國主義和軍國主義，轉移到對華戰爭，攻擊一切自由主義，轉移到崇信日本高於一切和皇族的神聖了。日本的農民和工人對於天皇的作用還沒有全部失望，還沒有知道官僚正和地主、廠長一樣是他們的壓迫者。在羣衆還可以被愛國情緒所麻醉，還相信對外侵略可以繁榮和解救飢餓的時候，革命還可以不致爆發。現在破產和絕望的農民、工匠、小僱主、小商人小地主等把憤怒和失敗表現在中世紀的陰謀、秘密團體、和暗殺「腐敗的政客及自私的資本家」，表現在反對資本家和極端國家主義的所謂法西斯主義。現在，大部人民還跟隨着地主與軍官的領導，即軍事法西斯的領導，但這並不是說他們不在變更了的條件下接受主張推翻現代社會制度的份子的領導。只要

這些中間層一旦對軍事侵略的利益失望，一旦胡謫天皇並非站在各階級之上，而是與統治階級站在一起，那末他們的高難的經濟地位將逼迫他們反對現有的領袖。

所謂日本的法西斯

在社會的最上層，法西斯主義受到了官僚、陸軍軍官、大地主和某些大資本家的支助。在這一方面，日本法西斯主義是從純粹反動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自明治時期即已存在，並且一直是皇朝及其警權的強力支柱。這些份子，當大戰後日本似乎走向民主時，曾一時斂跡，自從世界經濟恐慌及日本割去滿洲以後，他們又抬頭了。他們企圖支配或代替許多民衆團體，絕望的中等階級和農民的團體，並且將他們的仇恨和失望多少移轉到極力支助侵略中國，和反對勞

工、佃農以及激進的知識份子的警察恐怖主義方面了。

領導着法西運動的是統治階級中的封建軍閥，以荒木大將爲其首。這叫軍事法西運動。它的力量，大部依靠在鄉軍人協會，這種協會滿佈全國，使軍部的意見可以傳到每一個鄉村。協會的會員是帶點強迫性的，包括一切退伍的軍人，這就是說，每一個農民家庭至少有一個會員。據說會員一共有四百萬人。靠了這個組織，荒木及其支助者開始發動全國支助他們的武裝侵略亞洲的計劃，並作欺騙的宣傳，宣傳打倒「自私的資本家」，「貪污的政客」，並保證救濟農民，救濟小商人，節制大資本，減低利息，以移民滿洲來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他們再三向人民保證日本征服中國成功後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

但這些軍事法西宣傳者最終還是代表着地主、職業的軍閥和一部份官僚的

利益。是的，他們真恨代表「金融資本」的財閥，財閥可享受種種現代的奢華而他們則十分貧困。他們痛恨大資本家從一九一八年起把持着政權。不過軍人沒有大資本家是不成的，不論開戰或發展滿洲，都需要金錢。不論荒木派怎樣高呼反對「貪婪和自私的資本家」，但要改變就祇有社會主義經濟，而社會主義經濟便要消滅封建和半封建份子如地主、官僚、專制政體以及半獨立的軍隊等。所以軍事法西斯主義是虛妄而不合現實的。不管他們在口頭怎樣講，他們在實際行動上還是與大資本家妥協和勾結。

少壯軍人

但法西運動的軍人並不都是這樣的。許多陸海軍的少壯軍人是真正想消滅獨占資本的，真想在滿洲建立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或「封建社會主義」。一般少

壯軍人多半出身中下階級，在中級軍官中佔很大的比例，許多是恐怖團體的會員。他們和大官僚、軍人貴族、大托拉斯並無社會的聯繫。他們沒有升大官發大財的希望。他們都是小地主、較富的自耕農、小工商者的子弟他們的薪俸極低。照日本陸海軍的俸給，下級軍官只有十二鎊一年，官級較高的從五十八到一百鎊一年。在一九三一——三二，年俸六千六百元的海陸大將只有十五人。

而且出身平民的少壯軍人絕無升遷的希望，因為不像軍隊中的富家子弟，沒有在軍官學校畢業。自一九二七年，志願兵法案通過後，凡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服兵役滿了一年並受試及格的人方可以充任中級軍官，這個法案使中下階級的子弟能充任中級軍官，但要想升遷較高的官職是極端困難的。年老的軍官大半繼續霸佔着高位（日本的聯隊長普通至少是五十歲）可是自一九三〇起荒木系軍閥開始控制着軍部並且繼續到一九三三年荒木倒台爲止。這個荒木所

領導的團體並非由軍人貴族所組成。因此他們成了「民主派」軍官的領袖，裝出和財閥政客沒有關連的樣子。他們自認爲適當的人物來領導第二次歸政和建立更公平的社會的運動。

在社會的頂端，通常稱爲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是官僚和軍閥中最反動的部份。他們想恢復對新財閥的政治支配，和對農民及中下階級的道德支配。平沼和田中都高呼軍部領導全國來克服國難，因爲政黨都不可靠。這種法西斯主義，不過是家族制度政治的復活而已。

共產黨是日本現有社會制度的威脅

在日本只有共產黨才主張徹底解決日本經濟、社會的危機。日本沒有反對「封建思想，封建行爲」的真正自由黨，改良主義的工黨也很微弱。只有個別

的自由主義者，如尾崎雄行等擁護自由主義和間或作反對軍國主義、帝國主義和反動行爲的呼聲，但這一類人很少，也沒有什麼後盾。實際上日本沒有真正的中等階級來作強烈自由主義運動的社會基礎，前十年的自由主義者現在都成了法西斯了。在日本，共產主義和它的政策是被人認作推翻現政的唯一代替物。因此，它們受盡當局的種種野蠻壓迫和不斷地肅清「不穩思想」。

雖然共產主義已經被壓到地下，雖然共產黨常被處死或終生監禁，雖然一大部份勞工運動轉到幫助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雖然由於羣衆的窮困和失望而發生的革命運動在目前被分散到反動和盲目的愛國主義，但革命的精神不但沒有粉碎而且一直是統治階級和現有社會制度的最嚴重的禍根。

只要一個軍事上的挫折——還不必什麼失敗——或只要確切證明了軍事領袖正和政客一樣地準備出賣於大資本家，目前羣衆的反動愛國運動立刻會轉變

到共產主義，或走向叛亂和革命一類的毀壞和危及國家的信用與穩定的活動。

軍人貴族實在是弄火。現在這個火就是直接反對中國，蘇聯和一切其他的國家，反對一切在日本的激進的或社會主義的思想。可是，風向會轉變過來，或者這個火碰到障礙，轉而燒燬玩弄它的人。

雖然日本共產黨的勢力，因了新聞檢查和秘密審判和它在目前被驅入地下而無法測定，但當局對大中學以及無產階級中的「不穩思想」的焦急，對佃農協會的野蠻壓迫，幾個月後或竟是一二年後才准發表的大批地逮捕人民，天皇每行出巡時的「集體逮捕」，共產黨在佃農中的勢力和不計生死的左翼的活動——這一切證明了這種運動依然很強烈和許多人堅信只有共產主義才可以解決人民的痛苦和飢餓。

每一年總有成千成萬共產黨或「不穩份子」被捕，並且宣布這是「最後一

次」的蕭清，可是好像一直有新的黨員和新的領袖不顧酷刑，監禁和死刑準備繼續幹下去。這是由於日本政治經濟的絕望，沒有改良與和平進步的可能。青年不做烈士，只有自殺。每年因絕望而自殺的總有幾千人，可是更多的人却加入了革命運動。根據各種材料，可以證明日本的地下活動是非常的強烈。被捕的多半是學生、教員、作家、教授、工人，有時是農民，有時是政府職員。可是在被捕的人中，表明了共黨主義已經伸入日本最貴族的家庭。過去幾年，有九個高等法院的審判官因「不穩思想」而判罪。

是的，有許多被捕的在反省後而釋放的人，普通都是因為受不住酷刑或家屬不能生活。反省的人常常在文書簽「轉變」二個字。但是，有一個轉變了的共產黨懸梁自殺，並留下一個短簡，說「我雖轉變仍無辦法。」這代表了典型的成千成萬在壓力下反省的人，雖然他們沒有自殺。

日本火藥庫遲早總要爆發的

那些偏袒日本的外國人，那些英國的保守黨夢想日本是遠東的安定力，是一個進步和文明而有秩序的國家，可以拯救亞洲於共產黨之手和保護英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的利益。這些人至少應該明白他們在和一個火藥庫接近。這個火藥庫充滿了對西方的瘋狂仇恨，尖銳的社會對立，無衣無食的千萬工人，農民，和毫無出路的小資產階級潛伏的怨毒和狂怒。這個庫遲早必定要爆發的。我們決不要夢想日本繼續勝利地侵略中國就可以消除爆炸的危險。征服中國或一部份西伯利亞決不能拯救日本帝國主義，也不能解決農民問題或有益於小工業家的生活。日本的更進一步的帝國主義擴展，祇是加廣巨富與赤貧之間的鴻溝而已。（汪衡譯尤提萊作）

二 日本社會革命的初步考察

一

即在中日的不宣而戰的戰爭爆發以後，我們主張抗戰的論者，每喜歡把期望中的日本社會革命的誘起，認為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這即是說，我們預測日本的國外侵略戰爭會化爲國內的戰爭。誠然，一切戰爭，不論勝敗，只要規模相當的大，期間相當的長，都會引起社會的危機和威脅支配階級的地位，不過這種社會危機會不會爆發爲社會革命，社會的矛盾要不要靠無產階級革命來解決，以及這種革命能否得到成功，就要看這一個國家的社會革

命的客觀和主觀的條件怎樣，以及戰爭對於這些客觀和主觀條件的影響怎樣而定。所以，日本的社會經濟危機之因長期的戰爭而發生，雖無可疑，但關於社會革命的必然性的預測，我們還要把日本的客觀和主觀諸條件先加以詳密的攷察才行。

從蘆溝橋事變到現在，已快到兩個月，但以日本政府的高壓，和言論統制新聞封鎖的政策的厲行，戰爭爆發後日本國內的社會經濟情況怎樣，內部矛盾的開展怎樣，特別是有組織的工農大眾和他們的政黨對於這戰爭的反響怎樣，我們很難知道。不錯，戰爭的龐大負擔之壓在大眾的身上，使他們起厭倦戰爭之念和對政府不滿意，是可以想像的。其次從報上所露出的一鱗一爪，我們已看到這兩月的戰爭已激起日本社會內部的不安。不過，單從民衆的一種漠然的情緒的表現，或零碎片段的事實，來預測日本社會革命的前途，不獨是不夠，

而且是很危險的。

一方面因爲材料的關係，他方面爲時間和篇幅所限制，筆者在這裏對這問題也只能作初步的攷察。同時筆者希望對於革命理論和日本問題有研究的專家集合起來，把這問題共同檢討，才能得到有較概括和深入的結論。

二

「戰爭無疑地引起最困難的危險，使人民大眾的苦惱尖銳化到不可信的程
度。這種戰爭的反動的特質，一切國家的資產階級在「國民的」精神的掩護之
下，隱蔽他們的掠奪的目的之厚顏無恥的欺瞞，這一切作成客觀的革命狀態的
基礎，不可避地在大衆之間創出革命的雰圍氣。」這是伊里基說到帝國主義時
期，對外侵略戰爭與社會革命的關係的話。他雖又說要知道這種革命運動在戰

爭中或戰爭後勃發是不可能的事，但戰爭總可造成一種「革命的雰圍」，是革命的一個有力的導因。這因為帝國主義時期的對外戰爭本就是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產物，以及被用來解決這種矛盾的手段。可是，戰爭的發生，縱暫時能把矛盾錯過，却不能把牠消滅，而且隨着戰爭的展開，這種矛盾倒加深起來，造成一種有利於革命的環境。在歷史上我們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證。

例如以俄國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論，一九〇四——五年的日俄戰爭確給予革命以直接的推動力。伊里基曾說：『絕對主義把人民拉進去的犯罪的和可恥戰爭使人民忍無可忍了，民衆對於沙皇的軍隊的武裝的自衛的企圖開始了……』事實上，在戰爭以前，工業恐慌的更緊已使勞動階級的政治的鬥爭活潑地展開，沙皇尼古拉二世因想用對外的戰爭來轉移人民的視線。可是戰爭的結果使俄國死亡四十萬人，化去了十五億盧布的軍費，更暴露出絕對主義的政府的弱

體，開戰後被壓抑的革命形勢每因一次大敗而發揚起來，到戰爭將近終局的時
候，革命的火藥庫便爆發，連兵士也加入暴動的隊伍中。

不過戰爭雖可以造成一種革命的形勢，如果社會革命的客觀前提條件尚未
成熟，或主觀的力量不夠，縱已爆發為社會革命，結局終會失敗。後一原因在
好些場合は占決定的地位。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的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一方面是
由於農民的分散和缺乏組織，他方面由於勞動階級的組織力太微，在蘇維埃內
能夠擔負指導的使命者只有奧斯爾蘇維埃，全體尚無鬥爭的經驗之故。結果一
九〇五年只成爲十月革命的「預習」。

再以世界大戰而論，戰爭造成一種普遍的革命的危機，但各國所受的影響，
因本身的客觀和主觀的條件不同的緣故，而有種種不同。俄國有最貧弱的
資產階級，與腐敗透的舊制度，而同時有政治上最發達集中於大工業的無產階

級，和率領最經鍛鍊的勞動者的大多數的政黨並存，所以戰爭引起的俄國社會革命能夠實現。德國的工農大眾所受的大戰的痛苦不減於俄國，可是十一月革命發生以後，主要地因為社會民主黨——工人最大的黨——的腐敗和妥協性，革命便失敗了。在戰後的意大利，強方的革命潮流也洶湧起來，工人，農村無產階級和貧農，退伍兵都捲入這潮流中，廣泛的政治的經濟的罷工蜂起，工人甚至佔領工場，農民也提出土地沒收的口號來。這時意大利的客觀條件是很成熟了，但因為牠缺乏鞏固的勞動者組織，社會黨的行動又太不決斷，常只跟着大眾的背後跑，而不能指導大眾，意大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也失敗了，並且反激起黑衫團的羅馬進軍來。

日本對大戰的參加雖只限於遠東的德國根據地的攻擊和後來的西伯利亞軍事冒險，但這戰爭也顯然在日本創出第一次的革命寡頭。戰後的經濟恐慌首先

引起的一九一八年的「米騷動」，捲入一千萬農民，瀰漫全國。但因為這些行動的自然成長性以及與都市無產階級的確因聯繫的缺乏，以敗北而終，同時都市無產階級的罷工運動也達到高潮，而且漸帶有政治的色彩，可是因為徹底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缺如，社會革命的階段仍沒有達到。

以上的歷史的粗略的檢討，只想指出戰爭雖能一般地造成社會革命的危機，但這危機成熟和社會革命的實現與否却視乎各國特殊的情形而定。主觀的條件——有組織的工農大眾和指導他們的黨——特別重要。在戰爭發生後這個黨必須「意識到這種革命的雰圍氣，使之加深而且予以形態，」必須「有組織地確固地，向着這方向努力」——把帝國主義戰爭化為革命戰爭。「否則已爆發的社會革命也會慘敗。

當然，歷史不是重演的，而且在推測中日戰爭對日本社會革命的影響時，

兩個新因素——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存在以及國際的法西斯的活躍，也不能忽
略。

三

自大戰以來，資本的極端的集中，在廉價勞動條件下勞動着的都市無產階級的貧困化，受地主、資本家和高度租稅幾重剝削的農民大眾的普遍的破產，已使日本社會的不安與日俱深，接近於革命了。面着這種危機的日本獨占資本主義，因一九二九年世界恐慌的襲來，便用對外侵略戰爭來打出一條血路，併吞了我們的東北四省。滿洲的軍事冒險雖給予日本經濟以多少的活氣，日圓價格的低落也助長日本的輸出貿易，使牠的海外市場有部分的恢復。可是，滿洲事變後，所謂非常時的「景氣」實是主要地推軍備的擴充和通貨膨脹之賜，用

日本語來說，這是一種「跛行的景氣」，國內市場的狹隘，國外市場的堵塞，軍需工業與非軍需的工業發展的不平均，終會使這種「景氣」碰壁。滿洲取雖使日本的社會危機的爆發延宕了，但却把這危機加深。所以因「跛行景氣」的掩眼法以及「非常時」的高壓而告退潮的勞工運動及佃農爭議，只是暫時的。

到了最近的一年間，龐大的軍事預算，財政的膨脹，貿易的大入超，匯兌維持的困難，物價的反騰，勞工和農民大眾的赤貧化，使日本資本主義又走到了窮途，而不得不又拿戰爭來做「克服時艱的開道」（日本經濟週刊語）。其次，滿洲事變以來，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乘時興起，也是促進戰爭的一個原因。在他方面，因為大眾課稅和實漲的物價的壓逼，資方和地主的不斷的攻勢，大眾生活的極度惡化，在休眠狀態中已有數年的社會運動又澎湃起來。佃農的爭

議的件數到了去年忽見激增（一九三一年三千餘件到六千餘件）。在今年度預算編成的前後，勞工爭議的風潮在日本各地洶湧着。日本的工人的失業人數雖因火藥的景氣減少了許多，但實質和定額工資的減少，勞動的榨取的強化，使他們的生活情況更比滿洲事變前爲苦，在驟漲的物價的威脅之下，他們便不能再忍，而拿罷工的手段來反抗。今年第一季的勞動爭議件數已比去年增加了兩倍，參加人數增加了四倍。這種社會的不安當然也會使日本的統治階級想以對外戰爭來移轉國民的視線，造成「舉國一致」的局面。

現在，日本全國已給戰爭的毒的氛團籠罩着了，不過，日本縱然獲得暫時的勝利，戰爭必不能把上述的日本的社會經濟的危機解決。不要說，這回戰爭的性質比日清和日俄戰爭不同，愛國主義的欺瞞很難生效，而且戰爭的滿意必然使大衆深深感到。現在，日本的財政當局雖說極力避免大衆課稅，但二十

二億元的附加預算和百餘億的赤字公債的巨額的負擔終必轉嫁到大衆的身上。到了財政沒有辦法的時候，連惡性的通貨膨脹的採用，也是意料中事。軍需工業及與牠有關的工業的加緊擴充，雖可吸收了一些工人，但因戰時原料缺乏，國外市場縮窄，金融緊短的緣故，一般的產業陷於不振，甚至破產，都市無產階級的大多數的就業問題便受極大的威脅。同時戰時物價的高漲與糧食的恐慌，使廣大的勞農層的生活更加惡化到不可信的程度。在現在，我們至少已可看到戰爭發生以來，日本的輕工業的停頓，物價的急激的騰增。從日本要在華北輸入高粱八千五百萬元的消息（十月廿五日同盟社電，）可知國內糧食業已發生問題。

這樣說來，對華侵略戰爭只要延長一年半載，日本的社會經濟的危機必會爆發，革命的雰圍也無疑地會創生出來。日本現在雖在軍事法西斯獨裁之下，

有嚴密的警察網，而忠君愛國的意識形態也有相當的勢力，不過反軍閥反封建思想的運動早已開始；速戰速決的目的如不能達到，軍部紙老虎就戳穿，戰爭的痛苦也會使民衆衝破一切專制主義的藩籬。甚至工農出身的「皇軍」也會掉轉槍頭來對付他們的主人，所以，這次戰爭所引起的日本社會革命危機的爆發是無可避免的。

四

不過，在社會革命的危機爆發的時候，日本工農的鬥爭是否止於自發的性質，工農的組合和政黨能否把他們的鬥爭有組織地確固地領導起來，向着社會革命的途上努力，實是一個大大的問題。

我們知道，日本雖有六百萬的產業工人，但他們組織率很低，而且自一九

三二年以來反見下降，去年日本勞動者加入工會的人數只有四〇七，九八人，占全體的六·九%。國營工業在日本產業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以及大產業多帶有軍事的性質使一部分的勞動者習於愛國的傾向。他方面因為廣大的農民層的存在，都市無產階級在質上受了農民以至小資產階級的影響而常動搖。鬥爭力團結力很弱，事實上，日本的勞動運動以中小工場為基礎而發展，在大工場除輕工業外很少有組織。大多數的國營工場中的勞工組合不是逼於高壓，而完全失掉自主性，便是因完備的福利施設，而入於睡眠狀態。在現代勞工運動中佔領導的地位的金屬勞動者，在日本却對軍事的假的景氣仍抱有夢想。所以產業協力主義在日本勞工運動中向占優勢。

至於日本的勞動組織不獨是分裂的，左派，社民派，法西斯派相對峙着，而且這些組織多缺乏指導鬥爭的能力。例如今年初日本工潮澎湃的時候，到了

未組織的勞動者的自發的鬥爭已展開之後，日本最大的勞動組合之「全日本勞動總同盟」，及以最戰鬥的勞動組合自稱的「日本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才發出工資增高要求鬥爭的指令，現在代表日本的勞農層的最大政黨，就是社會大眾黨，但是牠妥協的態度，對工農鬥爭的怠工已爲我們所熟知，更談不到指導革命鬥爭。在前次的國會選舉，社大黨雖得到空前的勝利，但這種勝利只令牠側重議會主義更忘記了牠的議會外政治鬥爭的任務。代表左翼的勞農層的「日本無產黨」力量還是很微弱，在牠的影響下的，只有一部分的交通工人市政雇員及極少部分的其他產業工人，在前次的選舉且不見有甚麼進展。

日本農民的組織當然是比工人更落後，而分裂的情形也是一樣。左翼的農民組合雖是存在，但有很大部分的有組織的農民是在法西斯的影響之下。

日本的人民戰線運動在半年雖甚囂塵上，不過沒有甚麼大的成功，社大黨

和日本無產黨至今仍對立着。這使日本的工農的政治組織更加軟弱無力。

在華北事變發生以後，工農的政黨有甚麼變化呢？日本無產黨所屬的組合，首先被彈壓了，社大黨的黨首安部磯雄隨這些資產階級政黨之後，表示應舉國一致擁護政府。龐大的軍事預算，也由社大黨的代議士之手通過了，除了社大代議士河野密曾對大眾課稅稍有質問外，社大黨對於這次戰爭噤若寒蟬。

這樣說來，日本社會革命的主觀條件的微弱，是不容否認的。不過，我們却不能因此就根本否定戰爭不會誘起日本社會革命的爆發。因為持久的戰爭之會使工農的組織左翼化，反戰運動已潛滋暗長起來。日本的無產黨能否聯合起來，建統一戰線，領導工農羣衆以及兵士來作政治的鬥爭，反戰的鬥爭，實是日本社會革命實現的一個決定的條件。（思慕）

三 日本經濟的脆弱性

日本底經濟，因為受自然環境底限制和政治機構底限制，根本上是非常脆弱的，只要我們這一次抗戰能夠持久，必然會促使它走上崩潰之路，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我們拿日本經濟骨幹的工業來看，在目前是以不生產的軍需工業為中心的。這一點，日本軍部不獨坦白地承認過，並且還自以為是它底救星。

「……為保持並促進工業底繁榮，軍用品底製造是不可缺少的要件。因為這樣能使景氣好轉。現假定日本海陸軍每年消費的數億元軍事費即時停止，這時只要想像到日本經濟狀況將陷入怎樣的命運，則至少也可以了解現時軍事費

如何發揮了生產的效果吧！……』

這是不久前日本陸軍部所發行的小冊子『陸軍軍備擴充及其精神』中的一段話，從這一段話中，我們便可以看出它那促進工業底繁榮，使景氣好轉，全是靠着軍用品底製造的。

軍需工業與一般工業底不同，就是在於一方是供給不生產的消費，一方是供給生產的消費的。鋼砲火藥，只要砲聲一響，便隨之烟消雲散了。看那機器就不是這樣。機器可以馬上被用於生產，有正被消耗了便轉為勞動力，也可以從事再生產。所以軍需品工業愈擴充，國民經濟便愈危殆。

軍需工業也許能『促進工業底繁榮，』『使景氣好轉，』不過這種繁榮與好轉，只是少數大資本家底繁榮與好轉；它對一般中下階層是有害的，因為軍需工業底發展，使一般工業部門（一）在輸入原料上受限制，因之輸出不振，

(二)生產工具底生產減退，(三)一般工業底勞動者應召到軍需工業，使一般商品生產減退，(四)物價騰貴，國民購買力窮乏化。所以軍需品工業愈發達，一般勤勞大衆底生活便愈感不安。

工業底發展，是犧牲農業而發展起來的。日本在這種工業畸形發展之下，農產品與工業品交換底剪刀式狀態，更增大。下面的比較表，就充分地顯示出這一點。

農產品物價與農村需要品物價底比較

	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五年
農產品物價	七〇・五	三九・〇	五八・四
農村需要品物價	七三・八	四六・〇	六四・二

很明顯地，這種剪刀式狀態愈大，農民底生活便愈受威脅，而農民底購買

力也就愈加縮小了。

日本底農民，一方面因這種價格底剪刀式狀態底增大而被奪去他們底生產品底一部份，別一方面，又受地主底榨取，債主底摧殘，他們底生活，是處於非常悲慘的狀態之下。他們底一生，就是給地主生產地租，給資本家生產原料，給債主生產利息，而自己終歲勞苦却不得一飽。平時既受這樣不可忍受的壓榨，而戰時又要被送到火綫上去，爲別人拚命。他們也是具有智慧的人，不會永遠被欺騙的。一旦戰事持久，到自己底生命刻刻受着威脅，而妻子底生活也成問題的時候，他們就會想到：他自己爲什麼要白白地來送死！歐戰將結束時的俄國兵士，不是一致地要求和平與麵包嗎？

日本對外貿易，幾年來常處於不利的地位，其原因：（一）生產軍需品的機器，原料底輸入增加，（二）在日本內地的小工業不斷地破產，（三）在中

國的市場因排斥日貨的關係逐漸縮小。我們從下面的日本國際收支比較表上，可以看出它對外的惡化的程度來。

日本國際收支比較表

	貿易外的收支	貿易底收支
一九九三一年	(一) 一四九・〇四四	(一) 一四〇・〇二八
一九三二年	二・〇〇〇	(一) 六七・二三三
一九三三年	八八・八二五	(一) 八五・四三四
一九三四年	八・七四七	(一) 一四二・三四三
一九三五年	(一) 一九三・三二六	(一) 一一四・六九九
一九三六年		(一) 一三〇・一七六

備考：單位千日圓。(一)表示入超。

據塔斯社本月三日東京電訊：『此間中外商業報載，自中日事件發生以來，日本商業已受重大打擊，而以中小商人及專營出口之實業家受害最烈，本年迄今對外貿易入超空前高漲，達七億七千四百萬日圓，去年同期尚不過二億一千四百萬日圓。』

日本底市場，有很大的一部分在中國，如果我們此次抗戰能夠堅持下去，僅這對外貿易一項，便可以制敵人底死命。

日本底財政，早已走到困窮的境地，自一九三一年以來，爲了應付滿洲事件事費和軍備擴充費，年年發行鉅款的公債。到一九三七年止，公債底數目，竟積累至四十四億九千萬日圓，連一九三一年以前所發的，共達一百億日圓以上。每年所付的公債利息，要超過四億日圓。這些利息都是從勤勞大眾那裏榨來而脹滿金融資本家底荷包。

軍備擴充，還在無限制地進行，而公債底增發早已達到了它底飽和點。據經濟學者雜誌底計算，日本公債消化底餘力，有如下表：

公債消化餘力計算（▲表示消化力不足）

年份	新補資金 百萬元	產業資金	公債投 資餘力	全年日本銀 行承受公債	公債消 化餘力
一九三二年	五二五	▲七一	五九六	七一五	▲一一九
一九三三年	一、二五五	▲一八〇	一、四三五	一、一一五	三二〇
一九三四年	一、三七三	四〇四	九六九	七〇一	二六八
一九三五年	一、三九五	一、一二二	二八三	七五〇	▲四六七
一九三六年	一、八〇四	一、七二四	八〇	八〇〇	▲七二〇
合 計	六、三五三	二、九八九	三、六三四	〇八一	▲七一八

公債雖有較高的利息，可以使金融資本家佔一點軍需工業底餘潤，可是假

使公債增發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必然會引起惡性的通貨膨脹的。這麼一來，就有使財界陷於破產的危險，這是爲金融資本家所不能接受的。所以金融資本家都早有拒絕再行消納公債的意思。

租稅和公債一樣，也早已達到了它底飽和點。據經濟情報統計，日本在一九三四年，每人租稅底平均負擔爲一四·九一日圓，幾乎佔去國民平均所得額底百分之一〇，如果按照中下階級底國民所得額計算，已超過百分之二〇以上，從這麼重的租稅負擔看來，就可以知道日本底一般勤勞大眾，是怎樣地處在經濟底重壓之下。

蘆溝橋事變時，日本已追加預算達五億日圓以上，上海八一三戰事爆發後，據說日政府又有提出中日事件費二十億於臨時議會的消息。這事如果實現，它底財源，多半只有靠濫發公債來解決。公債底增加，必然會引起通貨膨

脹；最後甚至會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這樣，必然會使日圓像歐戰時德國底馬克一樣，逐漸變成廢紙。這時資本家也會受着影響而降低利潤或得不到利潤甚至破產。靠出賣勞動力爲生活的勤勞大衆，也因物價漲高而日益貧困化；靠薪水爲生活的智識分子，此時即使能領得到薪水也幾乎等於零。這時他們才曉得戰爭所給與他們的是飢餓和痛苦。他們爲要自救和互救，必然會集攏他們底力量，跟前方的兵士，走着同一的步伐，喊着一樣的口號：『要求和平與麵包！』這時，便是日帝國主義者崩潰的時候；但是要使它走到這一步，必須有一個條件，那便是要我們能夠持久的抗戰！（寇松如）

四 日本國民不堪戰爭的負擔與壓迫

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侵佔全部中國，進攻社會主義蘇聯，獨霸亞洲大陸的野心計劃，從它的「非常時體制」到「準戰時體制」的一切血腥文件和冒險行動中，已經暴露無遺。但是，在全中國四億五千萬民衆一致英勇抗戰的今天，日本帝國主義已遭遇到空前未有的困難，然而它還沒有絲毫悔悟的表示，却反以華北一時的表面的勝利，繼續麻醉並榨取其多數國民，使他們担上戰爭的無限重負。

在對華武裝進攻之初，日軍閥帝國主義者，顯然向其廣大民衆乃至一般資產階級保證過迅速的勝利。近衛、杉山、米內、賀屋，就是以這種保證，向八

月七日的議會驅取了五億餘元軍事追加預算的。但是「七七」以後對華侵略戰爭的發展，與日本軍閥預期的戰略，完全相反，前方後方却遭受到嚴重的困難，迫使我國中途妥協的那種幻想，也自行消失，戰爭已超越敵人的意圖，而陷入持久狀態了。

預料到國內民衆的憤懣和資產階級的責難，日本軍閥及其官僚政權乃加緊施行一切鎮壓手段，威逼利誘所謂輿論代表者的議會和全國報紙，掃清九月特別議會的各種障礙。這種政策得到了無恥的社會大眾黨領袖們的支持，使第二次對華侵略戰費二十億二千二百餘元的預算，「無異議地」在國會中通過。這前後二十五億元的預算，是作爲僅僅支持到本年終了爲止的；大藏大臣賀屋宣治祇「希望」過年後不致再有追加。然而這個數目已遠超日俄戰爭時日本的全部費用了，那時僅十五億零八百四十七萬元。

在表面上這個龐大的負擔並沒有直接加於民衆身上；政府是用全部不以增稅而以發行公債的方法來獲得，這是很可注意的。從這裏可以看出日本國民對於繼續增稅的潛在反抗，是如何之大，同時也可以看出政府是如何重視這一種潛在的反抗。但發行公債是積極擴大通貨膨脹的因素，換言之，就是從抬高日本已空前昂貴的物價中，「無形地」達到了榨取之目的。據東京朝日新聞社的調查，日本全國零售物價的指數，自本年以來，經過蘆溝橋事件，已在飛躍的高漲，其趨勢如左：

一月	一八七·九	二月	一八九·六
三月	一八九·五	四月	一九一·六
五月	一九二·二	六月	一九二·四
七月	一九三·七	八月	一九四·〇

九月 一九五·九

(以上均四除五入)

當然，零售物價的昂騰，並不完全由於通貨膨脹，還有一大部分是由於消費品生產的減縮，和入超的增加。資金調整法的通過，外匯管理法的通過，必然使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急劇集中於軍需品生產方面，加以軍需工業的高度利潤益發刺激了這集中的過程，於是國民消費品的生產乃日趨縮減。至於入超增大的原因，這裏無須詳言，現在所值得提出的：從本年一月到九月底，日本除了八月下旬和九月中旬稍有出超外，其餘全部是入超。總計入超已達四億四千四百十二萬九千萬元。這個漏卮在國際收支上發生極大的影響還不說，它的間接結果是「臨時輸出入措置法」的發動，即對於輸出輸入的全面統制。日本國民大眾的日用品有一大半爲外國物品所侵入，所以這一統制，就是減少他們消費品的供給，轉而提高一般的生活費用，（這在本月七日的「東京朝日新聞」

社論中曾露骨指出），降低國民的生活標準。

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日本政府如何迅速地將戰爭的担負，實際加在國民大眾的肩頭。這可以從三十三四億元戰時公債的推銷方法上充分看出。據大藏省十月五日公佈的省令，在「郵局窗口」售賣的所謂「小額國債」，已經決定自十一月中旬起開始發行了。統治階級以一切欺瞞的辭令掩飾戰爭的侵略性質，發揮鼓舞國民的愛國情緒，誘使他們購買公債。因為票面額過大的公債，無法推銷，所以開始發行二十五元，五十元等一張的債票，在「郵局窗口」售賣。歐戰中最早發行這種「大眾愛國公債」的是德國，那是從戰爭爆發後八個月才開始發行的，現在日本距自對華戰爭全面開始不到三個月，就着手動員這最後的財源，該是何等值得注目的問題！

九月特別議會除了二十億的對華戰費之外，政府還提出了十項戰時動員

的法令，如「米穀應急措置法」，「輸出入措置法」，「肥料統制法」，「外匯管理法改正案」，「臨時資金調查法」，「船舶管理法」，「馬之移動制限法」等，除了一件之外，全部通過。這沒有通過的是什麼呢？就是唯一比較給人民一些利益的「出征軍人減免稅法案。」但這也顯然是日本統治階級的一種夥謀手段：政府提了出來，而議會中的騙子們却主張『人民既可以拿出血肉貢獻國家，何惜一些賦稅？』於是又將原案否決。

日本對華作戰的驚人消耗，即使它的法西斯同盟者德國，都不得不替它擔憂。據中央社柏林九月二十二日海通電傳，德國預報社論已對日本近兩三月來的財政窘況，表示驚慌，推計日本每日在中國要耗費二千萬至二千五百萬元，若戰事延長至一年以後，此種戰費每日勢將增加四倍至五倍，因而結論表示「日本之主要問題，係財政而非軍事。」據日本各刊物的估計，來年的國家

預算將爲五十億元，其中軍事費將佔三十億，而所謂「中國事變費」還要另作別論。

在嚴厲的鎮壓之下，日本民衆已失掉了一切表示憤懣的權利。然而就是在這種黑色的鎮壓之下，我們依然還可看見許多微愠的不滿的表示。資產階級中若干陣營已不耐煩地提出「對華作戰究以達到何種程度爲限？」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答覆，至少有半打以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報紙如都新聞等，對於軍閥政府答案的不統一，曾表示過比較強烈的不滿，但也止於不滿而已。目前日本資產階級乃至小資產階級依然是屈服於軍閥之前。對於軍閥帝國主義者的冒險政策能加以摧毀者，祇有待於漸因不堪戰爭負擔與壓迫而以革命手段自動解除這種負擔與壓迫的日本廣大無產階級與農民；而這，又必須用我們堅決澈底的抗戰，纔能促其實現的！（劉尊祺）

五 日本國內反戰運動

日本這次對中國發動的新侵略戰爭，自七月七日的蘆溝橋戰事起，已將近四個月；自八月十三日的上海戰事起，亦快要到三個月了。在這期間，日本國內一般的情勢，自然是在強制的加速的由平時狀態移向戰時狀態中，但就這種推移過程中，我們同時却可見到反戰運動的醞釀。

自然，從蘆溝橋事件以來，日本全國都在爲『勝利』的空氣所鼓舞。在贊暴軍國主義者控制下的言論機關每天當然都在披露政府假裝的『決意』，經由遠征者不絕送回的『勝利』消息；『支那』的如何『不法』如何的『背信』，如何的『不堪皇軍一擊』等等宣稱無疑的在某種限度內，大有助於『豐臣秀吉

主義』的發表，然而，援軍不絕的派遣，強制徵集加速的進行，『臨時預算』接二連三的擴大，以及與這相伴而發生的物價飛漲，對外貿易縮小，國際關係惡化等等，都不免在『光榮勝利』的展望上，投下一大暗影；特別是當在華日僑帶回去的『實在消息』，和傷兵死屍連運輸船帶回去的『確實證據』，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欺騙宣傳，算是最無情的反駁了。所以日本軍國主義者與其『劫持』下的政府，儘管用盡手段，禁壓反戰運動的擡頭，並多方『閉錮』有關這種運動之『家醜』的外洩，但我們根據日本的一般國情，已經可以從幾方面斷定那種運動在演進，在醞釀，而況事實已給了我們充分的佐證呢！

我們且從以下兩個方面指證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的情形：

日本國內反戰爭的主力，當為廣大的勞苦羣衆與小市民階層。我們誠然用不着『誇張』這些薰育在軍國主義環境下的人民，對於被侵略的中國的同情，

但他們切身的利害，却能使他們對侵略戰爭，作更合理的判斷，在『九一八』事變以前，軍國主義者教他們把劫奪滿洲作爲解決經濟困難的唯一出路。但滿洲已劫奪六年了，據軍國主義者自己的『招供』，却是這般人民的生計日益艱難，體質日益孱弱，由『大日本的膨脹』，『愛國』，『發揚國威』，『直至目前由物價飛騰所增加的物质痛苦：由強制徵集所引起的離家停業的悲傷，由感到戰爭無意義所引起的憎憤以及對於或傷或亡所應有的顧忌，在在皆可促使他們痛惡戰爭，反對戰爭。在滬戰發生的第三日即八月十五，東京警備司令部，即取締流言蜚語，取締反軍反戰思想傳播，翌日，重申前令，並加重犯罪者的典刑，由此已不難窺見反侵略戰爭在暗中醞釀。而最近東京中心區神田一帶，居然發現有『反帝國主義戰爭』與『打倒軍閥一類標語』。京都宇治火藥製造所的爆炸，日本軍國主義者亦不諱言是『反動派』的陰謀。總之，反戰運動已

在日本國內醞釀着，而其原動力則無疑是受到戰爭犧牲最大的下層民衆及一般小市民階層。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宜忽視日本國內的另一個反戰爭力量，那即是金融資本卵翼下的商工業資本家階層。無疑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對外發動戰爭，儘管在主觀上聲言是爲了『發揚國威』，而在客觀上仍是做着資本家階級的走狗；而且他們每一次侵略戰爭的發動都有解決『當前經濟危機』的要求在敦促着；單就這點觀察起來，日本金融資本家階級倒不失爲侵略戰爭的發動指示者。但我們知道：日本的『金融資本』，一半爲軍國主義所補充，一半爲軍國主義所代替，』由金融資本迄今尙不能確立寡頭支配，而二重政府與二重外交政策的怪象因以產生，從軍略見地展開的軍國主義者的活動，和從利潤打算出發的資本家階級的要求，當然不能一致，則前者需要不絕的冒險，而後者需要相

當的和平。在這種範圍內，日本資本家階級，亦竟轉變為一個反戰爭運動的有力量要素了。英國太平洋問題研究會主席嘉德說：日本工商界在中國經營事業者，曾在華北和上海戰爭爆發以前，向政府發出警告，謂日本軍隊有一日盤據華北，則中國即一日拒絕與日本從事經濟合作，當時日本政府曾擬接受此勸告，撤退華北駐軍，但日本軍閥加以沮阻，不令照辦。『這一事實，充分體現了日本軍閥和商工資本家階級，在對華用兵問題上的反離意見。不但此也，歷年龐大軍事預算所課加在金融機構上的重壓，早使日本資本家階級要求獲有一個和平榨取的緩和機會。但對華發動大規模戰爭所招致的空前臨時支出，和由此戰爭所引起的對外貿易的困境，以及軍閥藉戰爭伸進金融及商工業等方面的統制魔手，均為日本資本家階級不能高枕而臥的焦心問題。他們的『心境，』早被漫發大言壯語的近衛文磨首相揭露了，他在赴御殿訪問西園寺公的歸途中

說：『……不得已漸次擴大戰綫，園公對此頗以爲憂，彼所憂者，固與任何人相同……，』當然特別與資本家階級相同，最近政友會要求政府明白確宣布對華戰爭目的，以紓國人惶慮，大體亦是代資本家表示意見。特領教了五·一五，二·二六等事件的日本資本家階級及其代言政府，對於軍人的跋扈冒險活動，當然不敢明白表示反對，但我們却不能因此就忽視他們在某種限度內的消極阻止戰爭的作用。當前日本軍閥之所以尙不肯公然發動對華全面戰爭，一方面固然在顧慮國際環境，同時也許不免在斟酌資本家階級的意見。

論到這裏，我可用下面這幾個論點來作補充的結束了。

一、日本國內的反戰主力，是包括有中小市民的廣大勤勞羣衆，而與這些羣衆站在對立地位的資本家階層，則不過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反對戰爭，戰爭在短期內能夠結束，能夠提供他們以更有利的市場，他們也許要很快的變爲勝利

戰爭的謳歌者。

二、戰爭的時間愈延長，其範圍愈大，日本國內屬大衆勤勞受到戰爭的犧牲，亦愈酷烈，而他們反對戰爭，由是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機構的運動，亦愈將深刻化表面化。結局反戰爭的運動，勢必隱含着社會革命的前途；而與中國方面愈擴大戰爭愈延長戰爭，則全國上下團結愈益堅固的趨勢，恰是一個對照。

三、在日本國內的反戰運動過程中，我們還得注意到日本屬領「準屬領」的臺灣朝鮮，滿洲等地的反對日本對華侵略活動。北滿南滿方面不時有襲擊日軍的消息傳來，朝鮮的革命黨，已經在響應我們了，假使戰爭能夠持久下來，敵人國內的反戰運動，將與其屬領的叛亂活動，形成其後方的致命的威脅。

我們由是看得出中國對日「持久抗戰」的光明前途（王漁邨）

六 日本工農的革命運動

我們記得，當一九三二年第一次上海戰爭爆發的時候，日本的「第二無產者新聞」曾對全日本工農大衆發出了如下有力的申訴和號召：

「遭遇了未曾有的經濟恐慌而已經頻於破產的日本資產階級，正在掙扎地找尋逃出這種恐慌的出口；可是要救濟資本主義，除出犧牲和破滅廣汎的被榨取階級，是再也沒有別的法子了。那一次戰爭曾經使你們的階級得到什麼好處？你們所得的，在後方，不祇是奴隸般的強制勞動，和血一般的苛稅嗎？在戰地，不祇是砲彈，鮮血，和『名譽』的戰死嗎？

「親愛的朋友：你們假使願意救濟你們階級的敵人，願意自身毀滅，那麼

你們儘去參加屠殺的戰爭，儘去爲着他們的祖國打仗吧！可是，你們假使希望自身的解放和勝利，那麼，你們應該堅決地反對打仗，起來參加反對這種戰爭的鬥爭。爲着勤勞階級的勝利，你們應該利用他們發給你們的武器，諸位，真正英雄的鬥爭日子已經近了，起來，對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祖國宣戰！起來，和寄生蟲，屠殺者的祖國宣戰！

「在軍需品及海陸交通運輸企業工作的勞動者諸君，不要輸送一個兵士到前線去！不要替你們的敵人製造槍炮和子彈！

「全國工場農村的工人和農民！失業的大衆，爲着貫徹你們的要求，立刻開始反戰的罷工罷稅和大衆示威行動！

「在前綫的兵士們！立刻和中國的兵士握手，大膽地和中國的勤勞者握手！」

響應着這種反戰的號召，當時日本的工人，農民和兵士們曾經前後繼地起來和日本軍閥作了無數的殘酷的鬥爭。雖則他們常時遭受到日本軍閥瘋狂的彈壓；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而退縮。當時及其後的他們許多英勇的行動，想來不健忘的讀者，一定還能記憶。

五六年來，他們的血不但沒有冷，反而他們在不斷的鬥爭紅爐中，鍛鍊出更堅強的意志，更多的熱情和更豐富的經驗，他們時刻在鬥爭着，同時在準備着，準備爲澈底推翻日本軍閥官僚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爲爭受他們自身解放的勝利而作決死的鬥爭。

這個日子現在快要到來了。反戰的呼聲，現在又已經像狂濤一般地在全三島怒吼着。據九月十日神戶電；「神戶大阪當地各大工廠屢有反戰傳單出現，除指摘軍閥侵略中國外，并勸告在鄉軍人及工人不要爲軍閥聲援……」又據九

凡九日華美晚報載：「日本在鄉軍人及後備軍人不願作戰，僱貧苦婦女頂替，故前線日軍女屍頗多。」再據念一日上海電：「日政府因滬戰失利，迭在國內強迫徵兵，應徵者以農民及小工商人爲多，此輩僅知出兵，而不知出兵之目的，個人生命事業全部犧牲，極抱反感。有藉故推託，不願應徵者，即被當局槍決；開拔時亦不許親屬送行，以減少刺激。如家屬有出怨言者，即停止補助，以示懲戒。因此民間反戰聲浪日益增高，即有武力亦無法維持。反戰印刷品被憲警沒收者甚多，輿論亦受統制。警所因左翼乘機活動，現正加緊嚴防中」

這些消息，我們只能說是對現實反映得不夠，決不會過分地吹牛。因爲只要根據目前日本工農大衆的生活狀況。也可以斷定這一回的反戰運動，必然要比一二八上海戰爭時更加激烈。日本工農大衆生活的惡化，連東京朝日新聞也

透露了些真實的消息：「日本最低生活代價指數，如以一九一四年水平爲一百，則本年一月份爲一八七、九，而七月爲一九三、七，中日戰爭爆發後，日用品價格，更加激漲……」

戰費無限制的增加，日用品價格當然要無限制的激漲，日用品價格無限制激漲，早已無法過活的日本廣大的工農大眾的生活當然要無限制的惡化下去。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還能相信軍閥們無恥的欺騙嗎？他們還能始終忍受着而不起來和軍閥拼命嗎？而況他們的反戰是和他們自身的解放分不開的。所以有覺悟的和有組織的日本前進工人，當然要起來負起他們應負的使命：堅決的領導全日本的工農勞苦大眾反對日本軍閥侵略中國，再一度的「對資產階級和地主祖國宣戰！」

雖然我們不能說，日本工農大眾的鬥爭，在一兩天內就可以得到澈底的勝

利，但是隨着中日戰爭的持久地展開，隨着他們鬥爭力量的日益加強，同時隨着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他們的勝利是可以預期的。

所以，怪不得有遠見的日本資產階級的老記者德富蘇峯要很憂愁地說：「特別議會開過了，臨時議會也開過了；但是我們的心境總覺得像在黑夜中被人引至山路中徘徊一樣。若果拿一句話來說完我們的心裏狀態，就是前途是黑暗如漆」了。（見八月念三日大阪每日新聞。）

日本資產階級的前途是「黑暗如漆」；那麼，光明的前途當然是屬於中華民族和日本工農大衆的一面！（強）

七 日本爆發社會革命是對華作戰的結果

一 兩種相反的對照

我們的全面抗戰，已經繼續了二個多月了，在這二個多月中間，日本的政
治、社會機構，形成怎樣的狀態？具有怎樣的反應呢？

不消說的，在表面上，我們不能否認，日本的動員和我們的動員，是成正
比例地進展的。我們的陣線，是堅強的全民統一抗日陣線，而敵人所號召的
是「舉國一致」，「發揚它的所謂「國際主義」」。我們在實行着空前未有的全國
各黨各派的團結，而敵人亦在策劃暫時停止法西斯、穩健軍人、重臣、官僚、

政黨、財閥的明爭暗鬥，以圖鞏固近衛內閣的實體。（如宇垣一成於一度遭刺後而被邀入閣，任對華政策顧問，以及新官僚河原田小原直等發起組織時局研究會，援助近衛內閣，同意加入者有荒木貞夫（軍人法西斯巨頭）。芳澤謙吉（老官僚）。後藤文夫、田中邵吉（新官僚）櫻內幸雄、賴母木桂吉。前田米藏。島田俊雄（政黨），建川美次（軍人法西斯巨頭）等政治情勢的推移，便是一例。）我們在發行五萬萬圓的救國公債，鼓吹人民踴躍輸將，而敵人於通過二十餘萬萬圓的特別軍事預算外，亦在發行二萬萬圓的小額面公債，用強迫的手段，向中小層人民承銷。

可是，在實質上，我們把它對照地比較起來，却表露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機構。

在中國抗戰的命令一下後，而政治的情勢，隨着很快地開展了，近十年來

的沉悶、抑鬱、糾紛、離合、散漫的力量，在統一抗日的大纛下，齊整而堅強起來，民主化的政治原則，展開新的前途。中國有的是政治的開放，而不是政治約束力的強化。可是，在日本，所謂「膺懲支那」的動員令一下後，馬上接着而來的是政治高壓力的加強。一切政治的活動，違反軍部意志的，都遭受嚴厲的禁壓。東京某日報總主筆，曾經私下告美訪員，說：『他們本來發行報紙的目標，是適合讀者的口味，現在則一味迎合軍部的意旨了。軍部所歡喜發表的消息，完全是他們所製造出來的宣傳新聞。其他朝鮮、台灣新聞，都被檢扣得乾乾淨淨。七月十二日，軍部當局曾召集各報各雜誌發行人及主筆指示如何發表華北消息，如何撰著社評，如何擁護軍部政策。各報並均奉令從事募捐現金及慰勞品，企圖使民衆認為各報均一律擁護軍部政策。（見本月七日上海英文大美晚報）』這一段談話無異坦白地說明了目前日本政治高壓力的真相，以

及一般比較有公正認識的輿論的苦悶情緒。

在中國抗戰一開始後，我們所怕的是戰爭的中途妥協的謠傳，不斷的和平空氣的傳播。因為這樣一來，中國嶄新的統一局面，又有分裂之虞，而敵人以華制華政策，又可以乘機大肆活躍了。我們的抗戰，一經發動後，是決不能終止的，我們要戰到最後一寸土，戰到最後一滴血，而中華民族的光榮的生命，就成長在這艱苦的環境中。可是，在日本戰事還沒有持續到三個月，而日本的財閥，已有反戰的暗示了。代表金融寡頭的報紙東京中外商業新報曾載著名評論家津村秀松一文，指出：『日本戰時求舉國一致易，惟戰後萬一對中國交涉，不能保障東洋永久和平條件，則國民必怒髮冲冠……』這論調實充分足以代表財閥的；心理的戰而勝，財閥固然是「感恩」的，可是戰而敗，財閥必然怒髮冲冠了。

在最近前線敵人的陣地上，我們又發見了日本無產黨所屬各團體秘密散發的告出征中國士兵書，其中最精彩的一段說：

『哎！悲慘啊！你們遠適異國去流血賣血，果爲了誰的利益呢？軍閥與財閥是藉了戰爭，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私圖！……我們不能再受軍閥和財閥好聽的宣傳所欺騙了，戰爭與大衆生活的地獄化，在軍閥的野心和財閥的榨取繼續進行當中，絕不會有終止的可能，……』

『戰爭不一定是愛國，真正的愛國，真正的國家觀念，乃是大衆生活的向上。蹂躪大衆生活的軍部和戰爭，才是民衆的敵人，國家的螻賊，我們要即時和平！軍部啊！還士兵的命來！……』

這一篇鮮血淋漓的血淚之詞，湧現着無限的悲苦的反戰爭的情緒的。日本一般國民大衆的反對戰爭，反對軍部，反對財閥，在這一篇告士兵書中，赤裸

裸地透露出來了。

不但是日本的一般勞苦大眾如此，而軍人機構中，有許多反對戰爭的。他們主張進行昭和勤王的義舉，剷除軍人法西斯的專政，因為這次對華戰爭的發動，不是日皇的本意，而是受了法西斯軍人所挾持的。日本現役將校有志圖，在其致在華北的將士書中，曾把日皇的真相向士兵宣佈，言：

『九月四日天皇陛下幸臨時議會時，發表了下述意味的勅語：『日本爲了國際和平，應刻不容緩的趕緊停止戰爭。與中國以中正協易的態度從事交涉，實現東亞的和平』，被上述勅令驚駭了的軍閥，立刻禁止議會附近的交通，用憲兵的特別警戒監禁議員，防止他們自己大罪的暴露。……軍閥要廢立今陛下，以與軍閥方便的秩父宮爲天皇。軍閥真實是昭和的叛逆者，好好忠實擁護今上陛下啊！……決心即時撤兵，即時和平！

以上所列舉的許多事實，已經把日本各階層的對於此次對華侵略作戰所取的見解，大致暴露出來了。從這種事實中，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國內，鼓吹戰爭者到底是那一階層的人民？和我們的客觀情形，國民大眾的情緒比較起來，豈不是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對照嗎？

二 漿糊粘成的近衛內閣

在以內閣為中心的日本政治機構，近五六年來是表現着不可解結的矛盾的。

因為各階層利益的互相掣肘，因為和平與戰爭的需要各方相同。所以，近幾年來，日本政治上，發展着永無雷息的愈演而想尖銳，複雜的鬥爭。內閣此起彼伏，元老重臣，雖功在國家，而法西軍人，縛而殺之，宛如割雞！政府視

爲異變，把小兵士的性命槍殺了幾個，就算敷衍了事。真正的主動者是不敢公開檢舉的。日本的政治，已是恐怖的政治，強盜式的政治了！

在這種強盜式的恐怖政治情勢之下，一般保守的元老、重臣、官僚、政黨、財閥或明或暗地與軍人法西斯勢力進行着不斷的鬥爭，廣田內閣傾覆了，換了一個林內閣，林內閣被軍閥所揚棄，被政黨所打倒了，又來了一個近衛內閣。湯雖則換了幾次，藥還是原來的那幾味，變來變去，脫不了軍部專權的法宝！

『近衛文磨是西園寺公的最後一張牌！』（郭沫若先生語，）到了今年四月間，這最後的一張牌，元老重臣層也不得不打出去了，這一張牌的效果，希望能夠把日本的內政糾紛，短時間停止一下，財閥與軍部的互相殘殺，開一個較和平的談判，躲在背後放馬後炮的也把他拉出來。原因是中國的統一抗戰運

動，着着成功了，日本遭逢了近二三十年未曾遭遇的難關。「舉國一致內閣，」
「華戰時體制的確立，」
「確立大陸政策的具體計劃，」
誠爲他們的妥協運動的中心目標。因此，不消說，軍部對財閥是相當讓步的，而財閥對軍部，當然更不敢進一步的作過分的苛求了。

所以，近衛內閣的成立，不足以說明日本內部矛盾的削減，而是新的更擴大鬥爭的一種準備。換句話說，它的所謂「舉國一致，」不過是用漿糊黏成的，不過是軍部發動對外戰爭的張本。

目前近衛內閣中，最足以影響和支配內閣的，當然是陸海軍的槍桿政策，不過，我們如果僅是這樣直覺的觀察，又未免過分看重了軍人法西斯在日本政治機構中的支配力量。我們可以這樣說，近衛內閣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的表現，由幾種互相對立的力量，雜湊而成的。其中官僚的勢力，却佔着最重要的

地位，如財相賀屋，文相安井，商相吉野，外相廣田，法相鹽野，內相馬場，都是日本政治機構中著名的官僚集團。而其所代表的後台，頗不一致。近衛本人便代表三種勢力；（一）貴族官僚，（二）法西斯軍閥，（三）資本閥。財相賀屋商相吉野則代表革新的財界勢力，文相安井、法相鹽野、內相馬場、外相廣田則代表法西斯官僚的勢力的。此外，如遞相永井（民政黨），鐵相中島（政友會），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國民國盟），都是披有政黨的外衣，而具有法西斯投機官僚的實質的。

這樣的內閣，在平時，固然是緩和政爭的最好的工具，可是，在對華進行戰爭時，其本身的矛盾，就或明或暗地流露出來了。最近法西斯軍人的企圖暗殺宇垣一成（穩健派軍人的唯一巨頭），便是戰爭過程中的一種政變的企圖。可是這企圖並沒有成功，而軍部反而延攬宇垣入閣了。這可以說是軍部爲實行

對華作戰而對保守勢力的一種讓步。

必然地，對華作戰愈持久，保守勢力與法西斯革新勢力間的裂痕，會愈益擴大的。這從最近日本對華作戰的指揮人選的暗鬥上，以及陸海軍意見的不調和上，（即松井任敵方作戰主將而少壯軍人不服，陸軍任最高指揮官而海軍又不以為然的衝突。）很明白地可以看得出來。

至於那一種勢力會更抬頭？那一種勢力會轉趨沒落？其關鍵操在我們能否焦士抗戰一點上的。中國的勝負存亡，決定了日本將來所走的政治途徑。中國如勝利了，法西斯軍人的末日也到了，東亞的威脅消除了，和平正義回到人間了！

三 如果戰爭繼續二年以後

以上我們所述的，是對華戰事繼續進行中，日本內閣可能發生的變動。保守勢力與法西斯勢力可能發生的消長。這是偏重上層政治機構的一種分析。

除了這種變動以外，因戰爭而引起的人民負擔的加重，因戰爭而引起的農村破產的深刻化，因戰爭而引起的國民大眾反戰爭情緒的由言論而趨於組織化，行動化，乃是我們不可忽視的事實。

在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對華作的戰時候，日本國內人民生活將因此而更陷於悲慘的境地，這是不待言的。就城市的一般大眾來說，——包括小店員、工人、小商人等——在生活上，必然會發生了：（一）因急性通貨膨脹之進行，而影響物價的高漲，收入的無形低減；（二）因捐稅的增加，而加重這資產階級

所轉嫁的負擔；（二）因軍事徵發的必要，而加強徵調服役，延長工作時間等等的壓迫。就農村的一般農民大眾來說，在戰爭進行之際，必然會發生了：

（一）軍需徵調服役的加強，徵兵制度的厲行；（二）捐稅的加重；（三）因農產品輸出貿易之銳減（如絲茶等），使農村陷於二重破產的境地（女工失業，收入減少），（四）農民離村現象的更形顯著（農民都被徵發到前線送死或軍事工廠做工去。）這樣，戰爭對於他們，畢竟又有什麼實惠呢？有的是苦痛，深淵裏的苦痛啊！

其次，日本對華侵略作戰的結果，因我們的東亞各弱小民族抗日大聯合的號召，將更加促成朝鮮台灣諸被壓迫民族的獨立運動。這一組織，在平時本是秘密的，到了這時候，立刻演化為軍事的意義組織正式的朝鮮台灣對日作戰的軍隊，以動搖敵方的內部，堅強我們民族聯合的力量。

關於朝鮮的獨立運動，台灣民族的歸復祖國（我國）運動，近年以來，實際上是積極進展的。已成爲今日日本朝野所最憂慮的問題。他們憂慮的是整個民族感情的隔閡，以及我國民衆的同情他們，多方援助他們。去年張翠川越進行外交談判的時候，日方竟也把「請勿援助台灣朝鮮民族獨立運動」一項，列爲談判的條件之一。

當然，我們要使日本內在的政治社會機構，發生內潰，並不是短時期內所能做到的。我們如果希望戰事延長到六個月以後，就可使他們內部發生政變，那只是我們的一種理想，一種僥倖。我們如果不能堅苦地持久到一二年以上，這一種變動的發生，是很少可能性的。

總之，日本對華侵略作戰的結果，其政治，社會機構上的矛盾，必然會更深刻化，那是無疑的，然而，這還有待於我們本身的努力。（王紀元）